

7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述略*

武志勇, 王泽坤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 与政治制度变革和政治路线变迁相适应, 前30年的新闻史研究, “革命史范式”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队伍人数较少, 研究对象局限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后40年的新闻史研究, 新闻史的学科地位确立, 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 “新闻本体范式”兴起, 研究范式多样化, 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 学术队伍人才济济, 学术成果丰硕并走向世界。此后的新闻史研究, 须更多负起“资治”“知来”之责, 创新研究范式, 填补研究空缺,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史学。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中国新闻史研究; 新闻史学科建设; 学术思想变迁; 研究范式与成果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9)05—0007—09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19.05.002

A Brie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During the 70 Years (1949—2019)

WU Zhi-yong, WANG Ze-ku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radig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had take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the first 30 years. The scope of research team was small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was limited to proletarian journalism. However, the study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has established the discipline status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spired by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academic idea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diversified. Meanwhile, the paradigm of "journalism ontology" is emerging and research paradigms are diversif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AHJC) also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academic teams. Since then, relev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and start to go abroad.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the late time should not only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of "assis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future management", but also innovat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fill up academic gaps, with the aim to construct the journalism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 history; change of academic though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achievements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至今已经走过70年的历程。与政治制度更革和政治路线的变迁相适应, 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两个时期, 即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的前30年和后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亦可分成两个时段, 其研究理念、范式、方法和成果, 各具

* [收稿日期] 2019-06-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2302-412121-17047)

[作者简介] 武志勇(1965—), 男, 山西永济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传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 传媒政策、大众传媒与中国社会、新闻传播史。

特色。

一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30年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党的新闻思想、新闻事业学习苏联的风气和历史研究的特点,引领、规范和影响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一情势纵贯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大潮涌起。

延续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思想,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然认为,报刊是革命的手段和斗争的工具。毛泽东指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报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报刊是党组织领导革命与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广泛、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1]149}毛泽东这段论述,明确了报刊作为新闻媒体在革命斗争与建设中的作用和责任。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闻界学习苏联蔚然成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是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新闻史研究的特点是“强调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轴,注重各时期新闻宣传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强调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2]40}。

1949年后的历史学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历史研究领域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支配地位。“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成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3]17}“一切都同革命挂上钩,是当时的时代特征”。^{[4]30}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之中。

(一)建国初期17年的新闻史研究

1. “革命史范式”为主,“政治工具”史学流行

受制于大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导范式是“革命史范式”。其特点是将新闻视为革命的工具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史的研究,阶级立场鲜明,斗争旗帜高扬,“以新闻事业为研

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5]38}。主要研究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宣传动员作用。在这种“党报本位”代替“新闻本位”的情形下,研究也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当中,变得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6]26},疏离了新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政治目的先行”“理论先行”成为常态。学术研究敌我阵营分明,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结论不以史料为依据,历史分析不足^{[7]242}。“以论代史”,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8]87}的研究也时有出现。“文革”十年中,“影射史学”更是粉墨登场。“将历史或历史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反科学的、为我所用的古今类比法随意篡改历史,寻找伪证据……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9]18}改革开放后,这种“政治工具”新闻史研究才逐渐淡出。

2. 成果以教材为主,个案研究和史料整理成果出现

这一时期,马列学院(即现在的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机构。1955年,马列学院新闻班将中国报刊史的教材编写列入工作重点,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序幕^{[10]135}。

新闻史教材成果较多,主要有马列学院新闻班编写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1959年)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2年)。这些著作大多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革命大旗高举,阶级立场鲜明。上述成果奠定了社会主义新闻史研究的基础。

个案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李龙牧在1958年发表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潘梓年等编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1959年)、丁树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1958年)。

古代新闻史研究方面,有方汉奇的《谈邸报》(1956年)、《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害》(1957年)等。

史料的整理方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汇编的三卷本《五四期刊介绍》(1959年),对五四时期的进步报刊史料做了梳理。此外,于上世纪50年代汇编成册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

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徐忍寒整理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1962年)。

建国初期17年,新闻史研究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对象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报刊。社会主义新闻史研究由此发端。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停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路线在学术领域大行其道。1968年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11],全面否定建国以来的新闻工作,新闻史研究就此陷入了长达10年的停顿。

二 改革开放至今40年间的新闻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党和政府的政治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革”结束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承继传统,迎纳国外先进研究理念与方法,学术研究风帆高悬,百舸争流。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春风浩荡,学术发展更是百花盛放,春色满园。

40年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统领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术研究。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继续得到坚定的贯彻执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云程发轫。从此,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新闻指导性、倾向性,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和探索,深化了新闻理论研究。同时国门开放,一些新闻学者开始学习和引介西方传播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信息”“受众”等观念的引入,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等的译介,“为新闻工作挣脱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机制的束缚,建立一套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新的新闻观念和传播机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12]。

历史学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也遭到否定。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戴逸作了《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

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13]。这一观点得到学者的广泛支持。此后,历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等新范式愈出愈新,大幅推进了历史学的繁荣。

40年间的新闻史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革命史范式”式微,新闻史学术地位得以确立(1978—1987)

1. 摆脱“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向“新闻本体范式”转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学者们抛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极“左”的新闻观念,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浩荡东风,对新闻史应该“怎么研究”“研究什么”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198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新闻史组召集座谈会,探讨“新闻史该如何编写”的问题。方汉奇提出,“报刊史要有报刊史的特点,不能写成一般的历史,或写成阶级斗争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报刊史应该打破党报的框框。”萨空了认为,新闻史研究应该“从实践中来认识,定框框先入为主不行”^[14]。座谈会强调,新闻史研究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会议否定了“阶级斗争”式的新闻史观,开启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198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再次举办新闻史研究座谈会。宁树藩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方汉奇强调“报刊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规律的”^[15]。在新闻史的研究内容方面,会议认为,应该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把研究报刊“宣传什么”转变到“怎样宣传”上,从报刊所根据的宣传方针和原则入手,探讨其宣传手段、策略和效果,进而揭示其背后的规律。还要从新闻业务如何反应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的角度着手,深究其所表现出的业务思想、业务特色等^[16]。上述两次学术会议纠正了极“左”的错误观念,将新闻史研究定位在新闻历史自身发展规律,研究目的不再单纯服务于政治和阶级斗争,而是转向揭示报刊的宣传策略、方法和规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闻本体范式”开始形成。

在新闻史研究从极“左”到“实事求是”的转变过

程中,方汉奇发表《新闻史是历史的一门科学》,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新闻史的学术地位。“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17]2},这种讲求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观点很快得到新闻史学者的广泛赞同。1987年,国家科委将“新闻事业”“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可。随着新闻事业独特性的被认可和尊重,新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得以凸显。作为新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新闻无学”的局面被打破^{[15]7}。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得以明确。

2. 传播学的传入及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0]140}。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在新闻史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时期的主要成果也大多采用这一办法。通史、断代史、各类专门史都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分析勾勒出不同时期、不同种类媒体的发展轨迹。此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虽能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路径平铺直叙地呈现,但对外在联系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剖析都需要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国外的新理论逐渐受到新闻学者的学习、借鉴,对现有研究状况的反思和改进也提上日程。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传播学的影响在大陆不断扩展,其独特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在学界引发争论。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首届传播学座谈会,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先进性”^{[18]96},其独特的调查法、量化研究法等备受关注。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启动不久,极“左”思想流毒尚未肃清,传播学及其研究方法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1984年,传入大陆仅几年的传播学便被打上“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烙印,打入学术冷宫。这种情况在1986年黄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才得以改变。此次会后,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其中不乏新闻史的学者。

3. 通史、断代史成果较多,专门史领域得到拓展,史料整理工作初步展开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新闻通史、断代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果斐然。

通史成果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方汉奇等编著的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年)、梁家禄等撰写的《中国新闻业史》(1984年)、李龙牧于1985年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复旦大学新闻史教研组在1986年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王洪祥的《中国新闻史》(1987年)等。其中,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注重于研究新闻宣传原则和内容的著作,其重心由“宣传什么”转到“怎么宣传”,观照新闻宣传对社会的作用,用历史分析代替了历史描述^{[10]133},堪称新闻史研究的一次创新。

断代史方面,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于1981年出版,该著作被誉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问世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19]7}。1983年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则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古代新闻史的重要著作。

除了传统的通史、断代史研究外,该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各类专门史领域也有所拓展。新闻业务史方面,李良荣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985年)从历史的角度描绘了中国新闻文体发展的历程,填补了新闻业务史研究空白。广播电视史方面,则有北京广播学院、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广播电视局合著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1985年),壮春雨的《中国电视概述》(1985年)以及赵玉明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等。该时期的研究在新闻思想史、人民军队报刊史、摄影史等领域也有所突破,主要成果有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1987年),黄河、张之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报刊史》(1986年)和马运增、胡志川的《中国摄影史》(1987年)。个案研究成果则有张友鸾的《世界日报兴衰史》(1982年)等。

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此一时期得到了加强,新闻史研究机构、高校和老报人通力合作,创办史料发表期刊,抢救史料。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研究资料》期刊,为史料性研究提供了平台。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5年的6年间,该刊累计发表了近600万字的史料性文章^{[20]25}。此期间,《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天津新闻史料》等地方新闻史料刊物也陆续创办,汇集了大量的史料与成果。

综上,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7年国家科委认可新闻事业属性,新闻史是一门“历史科学”的性质

和地位最终确立,“新闻本位”的研究理念成为主流,新闻史研究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

(二)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研究方法和成果百花齐放(1988—1999)

1. 中国新闻史学会建立

建立学术组织,出版学术报刊,是奠定学术基础、聚集学术人才、扩大学术影响的关键举措。1989年4月,方汉奇等学者创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获得民政部批准,该学会是新闻传播学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国家一级学会。新闻史学会一直保持着高频率的学术交流与座谈活动,不断针对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问题展开研讨,强有力地持续推动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学术事业的发展。

2. 对于新闻史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传播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

新闻史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新闻史研究的不足。

单波提出将中国新闻史作为一个有机体放入世界新闻史中加以整体考察,沿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思路去描述中国新闻业^{[21]20}。李彬认为,传统研究常常“事态确凿而事局朦胧”,尽管微观研究精益求精,却缺乏对历史的深层透视、宏观把握和有机分析^{[22]37}。在缺乏主体意识和总体性分析的情况下,新闻史研究也更容易受到政治与社会的影响,陷入学术怪圈,从而生产出大量同质化的成果。1998年在“98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宁树藩倡导,在研究工作中,应该“强化新闻史的主体意识,不要旁及到思想史、政治史上,去,要确立中国新闻史的总体目标”^{[23]37}。

20世纪末,传播学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得到了深化。1990年,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出版。尹韵公表示其研究成果受到传播学的启发。他认为,传播学的发展令新闻学摆脱以往单纯重视报纸本身源流,而对古代社会其他新闻传播现象关注不足的束缚,开阔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给学者带来了思想意识上的新鲜滋养。而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的史料,也因此获得了新生^{[24]3}。这部大胆采用传播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著作,描绘出明代新闻传播事业的总面貌,还深入剖析了不同社会要素与新闻传播之间的关系,著作的立体感和时代感丰满。

此时,比较研究法也受到学者的关注。“98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徐培汀提出应该重视中外

比较新闻史的研究。程曼丽则强调“横向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她认为新闻学一方面受到国界限制,需要适应本国国情;另一方面,新闻学又不受国界限制,与其他国家共享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因此,应该运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方法,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将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新闻发展的“点”提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面”上去,从而确定本国新闻发展在世界整体发展中的地位^{[25]57}。

个案研究法在这一时期亦得到运用。学者通过对单个案例的细致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案例透视整个时代的环境与特征。如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由一个人物折射整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面貌。

3.《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专门史、个案史及史料整理成果丰硕

研究成果方面,1992年,方汉奇主持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正式出版。此后,第二、第三卷也于1996年和1999年相继出版。该套著作由24个部门共50位学者共同完成,全书263.5万字。覆盖公元前三世纪至1990年共2200年时间。除报刊史外,还兼及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漫画、广告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26]32},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的一座丰碑。

此外,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纲要》(1990年),刘家林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方汉奇、陈业勋等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9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纲要》(1998年)和丁淦林于1998年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著作亦是通史类的重要之作。

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年)、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年)则是古代新闻史研究的著作。仍专注于报刊史研究的著作则有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1990年)、倪延年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年)。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年),方汉奇、陈业勋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1992年)等著作则是深化了现当代新闻史研究。上述著作作为断代史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弥补了诸多学术空白。

专门史和个案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专门史方面,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广播电视史类著作新作叠

出,解放区广播、当代广播、当代电视等领域的研究均有收获。其中较为典型的成果有赵玉明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年)、《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97年),郭镇之的《中国电视简史》(1997年)。

学者还对新闻教育史有所研究,如邱沛篁的《四川大学新闻系十年(1981—1991)》(1991年)等。少数民族报刊史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包括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年)和特古思朝克图、王秀兰编写的《蒙古文报刊简史》(1999年)等。

个案研究包括党报、资产阶级报刊、著名报人等,着力“打深井”。其中党报类个案研究成果有四川日报史编写组的《四川日报四十年》(1992年)、廖永祥的《新华日报纪事》(1994年)、陈华鲁的《大众日报史话》(1995年)、王敬的《延安〈解放日报〉史》(1998年)等。资产阶级报刊个案研究则有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年)。关于报人的有前述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等。

史料整理方面,有一些资料汇编。1991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问世,将近代中国的报刊名称等信息进行了系统收录和整理。还有王文彬的《中国现代报史资料辑》(1996年)、广播电视简史编辑部编纂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电影大事记》(1997年)等。地方新闻志撰写也多地开花,如《武汉市志·新闻志》(1991年)和《福州新闻志·报业志》(1997年)等。地方广播电视志有《自贡市广播电视志》(1990年)、《鞍山市广播电视志》(1990年)、《吉林省志·新闻卷·广播电视》(1991年)等。一些个案史料也得到了充分挖掘,如洪惟杰的《戈公振年谱》(1990年)和方蒙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大事记实录》(1993年)等。

1988至1999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齐。这十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期,研究组织成立,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以传播学为代表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对新闻史研究冲击强烈。在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运用传统方法整理和分析史料的成果也颇为丰富。

(三)研究方法博采众长,成果开始走向世界(2000—2019)

1. “社会史范式”等范式引入,广泛汲取西方传播学和相关学科研究方法

2002年,吴文虎再次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本

体论”问题。“研究中国新闻史,究竟是建构于研究新闻本体即事物本身的种种形态及其内在的发展,还是把新闻依附于有关联的客体(社会发展、革命斗争等)之中,侧重于以客体解释主体,统管主体,这是涉及研究取向的重要问题。”^{[27]208-209} 黄瑚主张,应该“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28]44},并以此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重新分期。黄旦强调新闻史研究“本体意识”的重要性,“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已近百年,改革开放后新闻史的地位与性质得以明确,但是诸多成果仍旧受到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忽视了报刊本身独有的特性。因此,应该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并以报刊为主体,探讨其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与内在规律”^{[29]51}。吴廷俊认为,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问题,即在特定的学术框架下,只是做重复的工作,无法贡献出新的知识与成果。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学术视野过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5]5-6} 新世纪开始后,主体不明、范式单一、深度不够等问题被学者们深入反思,并逐步得到解决。

200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新闻大学》发起了“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有力地推进了新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也随之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一是社会史范式。李彬在《“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一文中阐释了其“新新闻史”的研究理念,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30]41}。在传播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下,媒介社会学理念也应运而生,该理念主要关注传媒与社会间的关系和宏观架构,主张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陈昌凤认为,美国的新闻史研究结合了社会学的理念,中国新闻史同样应该重视用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变迁^{[31]4}。李金铨主张新闻史要与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比如在剖析“文人论证”时,他提出应该“将‘文人论证’放在社会史、知识史或政治经济学的脉络来分析”^{[32]22},将新闻史研究立体化,多方面考察其与社会其他因素间的内在联系。二是媒介生态范式。媒介生态范式也是此时期被新闻史学者运用较多的范式。该范式主张以媒介为中心,在媒介所

生存的内外环境中考察其自身的发展模式。媒介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对象,所以应该将其当作是具有生命的主体来看待,而非简单以具有物性的客体视之^{[33]6}。三是现代化范式。重点考察媒介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现代化”范式,也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使用。

在传播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下,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出新。一些年轻学者将访谈法、内容分析法、量化统计法等运用到研究过程中,其成果严谨、系统、规范,结论也令人信服^[34]。2004年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便是将量化统计法运用到新闻史研究的典型成果。稍后,田秋生提出运用拉斯韦尔的“5W”框架来进行新闻史研究,通过探寻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要素来拓展新闻史的研究领域,将原来被遗忘的人物和事件重新纳入到研究体系中^{[35]81}。口述史学也被学者们广泛接受,这种“倾听历史”的研究方法扩展了史料的收集范围,抢救了不少濒临消亡的史料。张昆揭示了媒介批评在新闻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媒介批评已经使传统的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视角”^{[36]14}。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方面,樊亚平关注人物的职业心态,将社会学的“职业认同”引入到新闻史人物研究中去,“感知报人的职业理想与困惑,呈现其职业心态史”^{[37]103}。李金铨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论训练,可以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史料,以此洞察史料背后的内在联系。建议学者从默顿的“中距理论”中汲取养分,使其与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38]29}。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参照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关注中西方文化交流,并以此为参照进行新闻史的解读。此外,概念史学、心理史学、影视史学等研究方法在新世纪的新闻史研究中亦受到重视。

2.《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问世,研究领域扩大,探索深入,成果多样化且走向世界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宁树藩主持编写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经过26年的艰苦雕琢,该书于2018年9月问世。研究涵盖了中国全部省份自1822年至2000年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包含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一些史料更是第一次被

整理发掘,堪称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地区覆盖面最广的著作。

一批基于新史观、新范式和新方法的著作也相继问世。2007年,李彬的“新新闻史”著作《中国新闻社会史》出版,运用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方法对新闻事业史进行考察,“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30]39}。同年,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问世,该著作透过媒介社会功能视角对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历程进行考察。2008年吴廷俊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新修》诞生,该书重点考察传媒自身的生存状况,将媒介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视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程。黄瑚基于“新闻本体范式”的研究著作《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和王润泽基于“现代化范式”的著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也相继出版。王润泽深入考察媒介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媒介的作用。其探索颇有新意。

此时段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还跨出国门,在世界学术圈亮相。2013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由国际知名出版社 *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走向世界。2017年,赵永华编写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5月, *Routledge Press* 出版了赵云泽和孙萍共同编写的 *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这是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首次出版中国学者的新闻史研究著作。论文方面,2013年, *Routledge Press* 主编的文集收录了郭镇之教授的 *A Chronicle of Private Radio in Shanghai*。2015年,何扬鸣的 *Hangzhou,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Press and Journalism* 在国际期刊 *Journalism Studies* 上发表。此后,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在英文刊物发表的越来越多。

21世纪初期,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必要而重要。徐培汀在2001年率先发起了对上世纪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评价工作,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2001年)全面梳理了上世纪的研究成果、经验及存在问题。

新的研究领域大幅开拓,成果显著。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成果有2004年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

新闻思想史》，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王晓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2009年)和王美芝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研究》(2019年)。图像新闻史研究，主要成果有韩丛耀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2012年)和《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2017年)。画报画刊史领域成果有彭永祥的《中国画报画刊(1872—1949)》(2015年)、吴果中的《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79)》(2017年)、蒋新平的《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2012年)。漫画新闻史方面，有胡正强的《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2018年)和甘险峰的《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史》(2018年)。报刊发行体制史的成果有武志勇的《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2013年)。网络媒体发展史方面，主要成果有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2005年)。针对某一地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有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的《台湾新闻事业史》(2002年)、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2012年)、于凤静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2017年)等。

3.《新闻春秋》公开发行，史料收集整理规模较大，成果多

2011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公开出版发行，大大推进了新闻史成果的发表和研究工作。

史料整理方面，2011年国家图书馆发起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多种民国新闻史料得以发掘，其中颇具价值的史料汇编有《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民国史料汇编》等。广播电视史的史料汇集侧重于特定时期，如赵玉明编写了《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2017年)和《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2017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料的整理，有王美芝主编的《红色中华社史料》(2019年)，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通讯社——红色中华社发表过的新闻稿件及相关文书等集成册。2019年武志勇主编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史料汇编》(8册)，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料做了系统梳理，集党的新闻政策史料之大成。

新世纪的头19年，“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

引入，研究方法更趋丰富。研究成果用多种语言发表。中国新闻史学会至今已经拥有22个分会，团体会员100余个，个人会员300余人，研究机构壮大，研究人员增多。《新闻春秋》公开发行。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的最好时期。

三 结 语

纵观7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愈来愈繁荣的进程。新闻史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和重视，成为新闻学科的主要分支。研究范式，由“革命史范式”而“新闻本体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及多种范式并存；研究方法从传统历史学的归纳和逻辑分析，而广泛汲取、借用西方传播学、社会学和现代史学的理论框架、分析工具；研究领域，由革命报刊而新闻传播的方方面面；研究队伍，在中国史学会的大旗下，人才济济，并搭建起《新闻春秋》这个学术发表和讨论平台；研究成果，则繁花耀眼，走向世界。

回顾过往，瞻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仍需在以下方面有更多作为，以推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一是弘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肩负“资治”和“知来”的重要责任。新闻传播活动，关涉舆论的引领，社会的沟通，民众的动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自新闻传播活动产生，至新媒体渗透进生活的角角落落，从新闻传播观、新闻传播政策、新闻传播事业到新闻传播实践，皆有值得总结的规律、学习的经验和深刻汲取的教训。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强调史学家应尊重历史事实和规律。新闻史研究也应该直面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训，以镜鉴当下，预测未来。

二是广泛汲取新闻传播学和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范式。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也同样如此。新闻史研究应该继续通过向外借取资源，创新更加丰富多彩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范式和方法。

三是积极填补当下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和欠缺之处，持续拓展研究领域。研究面向广阔、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新闻史研究仍有一些领域，少有研究者涉足或探讨，诸如科技新闻传播史、民众动员史、中外

新闻交流史等等。这也是新闻史研究的富矿所在。

四是立足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史学。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致信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新闻史学建设亦当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这是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基于此的中国新闻史理论建设和学术实践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①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M]//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49-154.
- [2]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新闻与写作,2007(1):39-40.
- [3]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J].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2):4-25.
- [4]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新闻大学,2007(1):28-32.
- [5]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5-12.
- [6] 单波.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J].现代传播,2001(4):24-30.
- [7]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J].江西社会科学,2009(11):241-245.
- [8] 李金铨.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J].新闻春秋,2015(1):87-89.
- [9] 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新闻大学,2007(3):17-21.
- [10]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J].复旦学报,2000(6):133-140.
- [11]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N].人民日报,1968-09-01:(1).
- [12] 郑保卫.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8(1):5-15.
- [13] 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J].近代史研究,2019(4):4-19.
- [14] 王凤超.如何编写新闻史——新闻研究所、北京新闻学会座谈会纪要[J].新闻研究资料,1980(6):167-170.
- [15] 邓绍根,张文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新闻春秋,2019(1):4-20.
- [16] 秦绍德.中国新闻史学术讨论综述[J].新闻大学,1982(4):118-120.
- [17]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J].新闻纵横,1985(3).
- [18] 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9] 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一百年(1917—2016)[M]//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15.
- [20] 张谦.激活历史——评30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25-31.
- [21] 单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新闻业命运的整体观照[J].现代传播,1995(4):20-26.
- [22] 李彬.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J].新闻大学,1996(冬):36-38.
- [23] 贾亦凡,汪幼海.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国史学会换届暨98新闻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1998(7):36-38.
- [24]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25] 程曼丽.横向比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J].新闻大学,1997(春):57-83.
- [26]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J].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 [27] 吴文虎.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M]//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206-210.
- [28] 黄瑚.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J].新闻大学,2007(1):44-50.
- [29]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1):51-56.
- [30]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39-43.
- [31] 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2] 李金铨.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3] 吴廷俊.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J].新闻春秋,2015(1):4-10.
- [34] 程曼丽.中国新闻史研究60年回眸[N].社会科学报,2009-10-08(5).
- [35] 田秋生.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80-83.
- [36] 张昆.媒介批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路径[J].新闻前哨,2010(3):14-15.
- [37] 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国际新闻界,2009(8):101-104.
- [38] 李金铨,张宁.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李金铨教授访谈[J].新闻记者,2014(9):28-32.

^① 需要申明,囿于资料和篇幅,本文未涉及台港澳地区和国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